

1915 致命龙袍

一代枭雄袁世凯的帝王梦

王巍 王鹤晴 著

新华出版社



1915 致命龙袍

一代枭雄袁世凯的帝王梦



王
魏

王
鹤
晴

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1915致命龙袍 / 王巍, 王鹤晴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4.11
ISBN 978-7-5166-1281-1
I. ①1… II. ①王… ②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现代史—研究—
1914~1916 IV. ①K258.0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1457号

1915致命龙袍

作 者: 王 巍 王鹤晴

出 版 人: 张百新	责任印制: 廖成华
责任编辑: 蒋小云	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	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	邮 编: 100040
网 址: http://www.xinhupub.com	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
经 销: 新华书店	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	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照 排: 李尘工作室	
印 刷: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	
成品尺寸: 170mm × 240mm	
印 张: 13.25	字 数: 183千字
版 次: 2015年1月第一版	印 次: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1281-1	
定 价: 28.80元	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

目 录

第一章 欲与天公试比高 / 001

第二章 如果再回到从前 / 017

第三章 日本趁火打劫 / 032

第四章 筹安会开张大吉 / 047

第五章 袁大总统升职记 / 058

第六章 师生万里赴戎机 / 076

第七章 北洋大佬小算盘 / 088

第八章 将军拔剑南天起 / 103

第九章 护国军鏖战川南 / 118

第十章 半壁江山风雷激 / 134

第十一章 八十三天洪宪朝 / 154

第十二章 自饮夺命“二陈汤” / 171

第十三章 反误了卿卿性命 / 187

参考书目 / 205

第一章 欲与天公试比高

一、皇帝的新衣

1914年1月，北京中南海，亭台楼榭，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
袁世凯端坐在居仁堂的办公室里，正绞尽脑汁琢磨事儿。

不久前，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，并让参众两院全体议员“停职休假”，代之以御用机关——中央政治会议，耳根子清静了不少，处理国事也舒服多了。不过，仍有一件大事让他耿耿于怀。

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革命党人死走逃亡，但革命党人制订的《临时约法》仍未废除。这对老袁来讲，就像一柄悬在头上的利剑，让他寝食难安。况且，临时大总统都“转正”了，《临时约法》也该转正啦，名正言顺，还等啥。

于是，袁大总统提起毛笔，略加思索，刷刷点点，给政治会议下了一道命令：造法机关应如何组织，其职权范围及选派议员应如何规定，均须克日答复，以便公布施行。

要知道，政治会议的议员老爷们都是袁世凯千挑万选的能人，接到“圣旨”后，哪敢怠慢，加班加点，点灯熬油，争取赶在春节前鼓捣出一个实施方案，也让“老头子”过个好年。

1月26日（甲寅年正月初一），政治会议向袁世凯报告“工作成果”：

一、造法机关可定名为约法会议，其职权以讨论增修《约法》为限；

二、约法会议议员共六十人，由中央及各省共同分配，议员由选举产生，选举人必须曾任高级官吏，或有举人以上的功名，或有财产一万元以上者为合格；

三、约法会议议员的被选举人先由政府编造名册，当选人以在名册内者为限。

以上条件是高了点，但由“精英”选出的“精英”，才是真正的“精英”嘛。

所以，对于这个《约法会议组织条例》，袁大总统还是基本满意的。不过，为了做做样子，摆摆姿态，他大笔一挥又加了一条：约法会议作为代立法机关，对本大总统平行行文，不必呈文。

能与袁大总统平起平坐，这个面子不小了。

经过“推荐”、“提名”、“选举”，最后由袁总统圈定，顾鳌、严复、王揖唐等60位约法会议议员名单很快揭晓。

3月18日，约法会议在北京开幕，孙毓筠、施愚当选为正、副议长。

孙毓筠这个老同盟会员，是老袁用来撑门面的。施愚是当时的“法制专家”，也是袁世凯夹带中的高级法律顾问，在约法会议里实际上说了算。

袁世凯高度重视，派代表到会场致辞。

他先是把《临时约法》骂了个狗血喷头：“《临时约法》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指任参议员所议决，无论冠以临时之名，必不适用于正式政府也。即其内容规定，束缚政府，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，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。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，身受其苦痛，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痛苦者，盖两载于兹矣！”

两年了，苦不堪言，我容易吗。

开幕式差不多成了诉苦大会，袁总统“忆苦思甜”，总算出了一口恶气。

“琴瑟不调，改弦更张……”老袁清清嗓子，接着说：“诸君富于学识经验，声望素著，其于吾国民情国势，必有灼见真知，而能谋福利以为根本之解决者。况共和国家，所借以巩固者惟宪法，方今吾国宪法，既

因事实上之障碍，而猝难发生，若长守此不良《约法》以施行，恐根本错误，百变横生，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。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《约法》，固信诸君发抒伟论，必有良好之结果，尤愿诸君宝贵时日，能为积极之进行也。”

最后，袁总统振臂高呼：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！

决不能辜负总统的期望和重托。约法会议的议员们想总统之所想，急总统之所急，夜以继日，紧张工作。40多天后，在袁总统所提出的“修改约法七条大纲”基础上，一部新《约法》终于“三读通过”，新鲜出炉了。

5月1日，袁世凯正式签署公布《中华民国约法》。

当天，袁世凯非常开心，微笑着对身边人说：“予今日始入政治新生涯矣。”

也难怪大总统这么高兴。

新《约法》共10章67条，全篇贯穿着“大一统”、“定于一”的思想，与《临时约法》和《天坛宪法草案》相比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了极致。

比如，新《约法》规定：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，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任；大总统召集立法院，宣告开会、停会、闭会，甚至可以解散立法院；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，任免文武职官；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，统率全国陆海军，决定军队的编制及兵额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新《约法》白纸黑字地写着：“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，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。”全篇再也找不到“内阁”的字样。

这表明，中华民国的政体无形中由责任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。

对于集权于总统及国家政体的改变，约法会议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：

首先，所谓国法，是由社会心理孕育而来，而社会的共同心理，又由一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。所以，造法必求适合于国情国势，

千万不能附和苟同，更不可“数典而忘其祖也”！

从历史上看，国家的治乱兴亡与政权的统一与否密切相关。一般情况下，政权统一则国家兴盛，政权分裂则国家衰亡。中国国体由帝制骤然变为共和，“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”，根本没有社会基础。因此，老百姓心理上还是重政府而轻议会。如果国家元首无权，或权力较小，政权无法集中，群情涣散，恐生大乱。

从地理上看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幅员广阔，南北各异，要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一管理，各自为政，分崩离析，那就离亡国不远了。

其次，建国伊始，百废待兴，风雨飘摇，当此千钧一发之时，遇事应该当机立断，如果权力分散，意见不一，多方掣肘，必然一事无成，危亡立见。而《临时约法》极力扩张立法权，极力缩减行政权，导致党争不断，晓晓不休，政令不畅，贻误全局。因此，必须“改订约法，扫除障碍”，才能达到刷新政治的目的。

再者，值此国家多难之际，如将挽救危亡的责任交给人民或议会，操作难，见效慢。况且，现在民智未开，程度低下，难以运用议会政治治理国家。所以，“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，其收效速而易”。

总而言之，约法会议的“精英”们谈古论今，强征博引，得出一个结论：议会政治万不适宜今日之中国，必须以总揽统治权，属之于国家元首。名以隆大总统之权，实以重大总统之责！

不是皇帝胜似皇帝。

袁总统也觉得这个弯子拐得比较大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便出来解释一番。

他说：“本大总统以毫耄无能之日月，处民国建设之时期，责任虽有所难宽，职权窃虞其过重。惟事关国家根本大法，究非一人所敢自私，亦非本大总统所能滥用……”

给我担子太重了，我老袁也不想这样，可事关国家大计，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为国为民，我只好豁出去了。

比较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
新《约法》给袁大总统披上了一件“皇帝的新衣”。从此，袁世凯在合法的状态下，有恃无恐，为所欲为，成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。

当新《约法》尚未公布时，《申报》就转载了《论中国政局之将来》一文。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：袁总统拥共和之名，行专制之实，将如何持久？今所谓共和，徒存虚名，易其名则帝制成矣！

二、相国出山

就在新《约法》颁布的当天，袁总统下令撤销国务院，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，“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”，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。

袁世凯一天都等不了了。

在此之前，老袁已经略施手段，让“第一流人才内阁”自行解体了。

在1913年7月组建的“人才内阁”中，进步党人士熊希龄、张謇、梁启超、汪大燮分别任总理（兼财政总长）、农工商总长、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。袁系人物朱启钤、孙宝琦、段祺瑞分任内政、外交和陆军总长，掌握实权。

尽管如此，进步党人仍额手相庆，沾沾自喜，准备依靠袁总统的力量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，大展宏图。用梁启超的话说，就是“非进步党国家无以保存”。

在梁先生的积极谋划下，“人才内阁”的施政方针很快出台。对内：澄清吏治，整饬纲纪，精兵简政，添设新税，裁汰军费，奖励工商；对外：爱重和平，尊重主权，敦睦友谊，速结悬案等等。

不难看出，“人才内阁”踌躇满志，很想有一番作为。

以梁先生为例，就任司法总长后，四十出头的梁启超雄心壮志不减当年，更加以身作则，励精图治。

他“排日到总统府、国务院、司法部三处，日接客数十，夜则拟法

案”。

他多次上书袁总统，要求确保司法独立，实行司法改革。特别强调要“在使审判之际，专凭法律为准绳，不受他力之牵制”。梁总长还认真开展普法工作，将有关法律条文、司法程序制成通俗易懂的布告，在城乡的大街小巷广为张贴，每月一次，广而告之，提高人民的法制观念，以建立法治国家。

对于进步党人这种“给根棒槌就当针”的行为，袁世凯“于心不喜”，颇不以为然。他觉得这些所谓一流人才，都是些穷酸秀才，“仅能提笔作文，不能胜任国家重任”。

袁世凯所控制的政治会议更是对熊希龄、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地方和司法制度改革“反对最烈”，以致“各省几至全然办不动”。

其实，袁总统对这拨高级知识分子早就心存顾忌，欲除之而后快了。

“二次革命”爆发时，进步党议员曾在国会中质问当时的赵秉钧内阁擅借外债、外交失败、穷兵黩武、压制言论，惹得老袁一肚子火没地方发。而梁启超更是恃才傲物，指桑骂槐，还说什么“以最下流之人当一国之中坚，其人格之卑污下贱，则举国无出此辈之右”云云。

这话说得太难听了。

那时，袁世凯需要利用进步党对付国民党，进而达到当选正式总统、解散国会、修改约法等一系列政治目的，只好忍了。

但是，忍了不意味着忘了。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的好戏更是袁总统的保留节目。

现在，袁总统的计划都一一实现，进步党人还蹬鼻子上脸，熊希龄甚至提出要划清总统与国务院的权限，老袁终于出手了。

借口是现成的，熊希龄的小辫子一直在老袁手里攥着呢。

1914年年初，北京、上海各大媒体重新热炒“热河行宫盗宝案”，添枝加叶，绘声绘色，轰动一时。

案件的当事人熊总理坐不住了，心想这件事袁总统不是压住了吗，怎

么又翻腾出来了，人言可畏，众口铄金，这叫我这个总理可怎么当？无可奈何之下，熊总理只好放下身段，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让内务部转交警察厅“查究其事”。

按照我国惯例，上司给下属打招呼“办事”，正常情况下，下属一定屁颠屁颠地把领导的事当做自己亲爹的事，办好办巧办到位，让领导生活舒心，工作安心，事事放心。

可这次很不正常。警察厅长看了熊总理的信后，把嘴一撇，批了八个大字：“交地方检察厅办理。”

更不正常的事发生了。地方检察厅也不含糊，认为总理来信纯属私人函件，不符公文程序，又批了八个大字：“飭具诉状，原件却回”。

堂堂国务总理落得如此下场，熊希龄大梦初醒，如果还赖在位置上不走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

2月12日，随着“盗宝案”愈演愈烈，熊希龄称病辞职。袁总统立即照准，并任命孙宝琦（袁总统的亲家翁）代理内阁总理。

几天后，梁启超、汪大燮也认清了形势，以“一介书生、未谙从政”为由翩然而去，只剩下张謇因放不下借款疏淮工程而暂时留任。

随着“第一流人才内阁”的垮台，进步党与袁总统的蜜月期结束了。

多年后，梁启超回忆他这段从政经历时说：“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，想带着袁世凯走上（立宪）政治轨道，替国家做些事情……然而，在中国政界活动，实难得兴致继续，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，全不相应，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……自此以往，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，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，皆当中止。”

学究下台，政客上场。

徐世昌，号菊人，1855年出生于河南卫辉。他比袁世凯大4岁，16岁那年与袁结识，二人惺惺相惜，引为知己，结为金兰之好，袁称呼其为“大哥”。在学业上，徐世昌要比袁世凯强得多，而立之年进士入翰林，那时袁世凯还是个“北漂”青年。

不过，徐大哥在仕途上却略逊于袁老弟，从小站练兵那阵担任营务处总办，到内阁大学士兼协理大臣，一直都是袁最重要的助手和谋士，论资历、威望，在北洋系统中仅次于袁世凯。

几十年的宦海浮沉，使徐世昌深谙中庸之道，老谋深算，处世圆通，人送绰号“水晶狐狸”。

大清国没了之后，已被清廷授予太保加太傅衔的徐世昌决心向伯夷同志学习，表示坚决“不入贰臣之传”，不食民国之禄，跑到青岛租借做起了遗老，高风亮节，不问世事，像个给亡夫守节的小寡妇。

其实，徐世昌是看当时民国初建，党政不断，形势混乱，不想引火上身罢了。

袁老弟做了大总统，自然不会忘了徐大哥。

老袁看出了此中端倪，有意成全老徐，连说：“俟我将这一起浑小子（指国民党人）撵了，再预备着迎接老大哥。”并三天两头写信问候，遇有重大事情还要随时电商。

据袁总统的身边人唐在礼回忆，在民国第一届的唐绍仪内阁中，“小事由赵秉钧一人独挑，大事就必与徐世昌相商，实际上徐好比是宰相，而赵秉钧、王士珍、段祺瑞、梁士诒等是各部大臣，唐内阁不过是遮场的幕幕吧。”

袁世凯将“浑小子”们赶跑后，从1913年7月起，急忙派出吴笈荪、王揖唐、李经羲、袁克定等重量级人物，多次前往青岛“劝驾”，请徐世昌出山组阁，老徐都借故推脱了。

老袁之所以这么急着让大哥帮忙，除了二人是最好的“哥们”、最佳的搭档外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

对此，记者黄远庸做了透彻的分析：“官僚派则固欲有利用徐氏者，有以今日政局非有总统信任之人为百揆长，不易统一……他人当家，人有异言，徐氏当家则必唯命是听；又如军人派，即以向曾多受徐氏指挥之故，深望徐之复出；其他则积恨朋党之把持者，谓非徐出则不足以扫清；

更有一派新学家向曾受徐恩遇者，则深望徐之出以开新近之路……”

老袁正是看到了徐世昌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才三番五次请徐出山组阁。更何况，深谙驭人之术的袁总统深知，从古至今，中国文人真心做隐士的基本没有几个，徐世昌也不可能例外。

袁总统签署的任命发表后，又派孙宝琦、段祺瑞“造庐劝驾”，请徐世昌“万勿推辞”。

据黄远庸分析：“关于徐之出处共有三说，一说谓徐决不出；一说谓不晓得徐几时来京，一时恐不见来；一说则谓徐非俟见正式命令后，必不来京。记者今日则深信后说为确。盖徐本甚消极，非待至水落石出，决不出也。”

实际上，徐相国也不好再拨总统的面子，半推半就启程赴京了。不过，他还是表白了一番：“世昌夙承知遇，仍当以散员居留京寓，遇有所见，随时献纳，仰备咨询，庶得稍赞高深，以尽其一民之义务。”

有人问了，来都来了，还忸怩什么！

俗语说，寡妇门前是非多。要知道，徐相国这次出山压力还是蛮大的。

就在老徐进京前一晚，他的弟弟徐世光问他：“大哥，你到北京干什么？你以前对我说的一时权宜、不忘清室的那些话，言犹在耳，才两年多，你忘了吗？你现在竟要做民国的官，太后和皇帝封你太傅衔太保，隆恩殊遇，有清一代能有几人。议和之际，你曲从袁谋，已为世人所不谅。今党人已败，你若再为袁效力，盖棺论定，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。”

听了弟弟的话，徐世昌含泪低头，一言不发。

路过天津时，他的老友华世奎又当众质问他：“两年前，你在北京怎么和我说的，我并没有忘，你怎么忘了呢？现在你要做袁的官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几句话，问得老徐哑口无言，弄个了大红脸。

这时，多亏有位高人在旁解围：“假如出山，也不过是为民国服务，不算做官。”

徐世昌进京后，袁世凯如获至宝，设宴款待，请老徐出任国务卿一职。

徐世昌还是那套嗑：鄙人“衰朽迟钝、世情淡忘、政务隔阂、不敢一试”等等，屡屡辞谢。

袁世凯认准了菊人大哥，认为“非徐莫属”，就又劝道：“难进易退，此为君主时代属于一家一姓者言之。若夫共和政体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同服义务。但当学伊尹之任，不当学伯夷之清。”同时，老袁又派出说客，各方敦促者纷至沓来，说什么“当胸怀天下、做官为全国百姓、不为袁氏一人……”

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菊人兄只好“向前走了一步”，答应只是暂时“帮忙”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坐上了国务卿这把交椅。

由于国务卿承总统之命监督行政事务，总统发布命令须国务卿副署，地位有点像古代的宰相。因此包括袁世凯在内，大家都称呼徐世昌为“相国”。

可徐相国却比较低调，始终坚持“合则留，不合则去”的原则，自书“后乐堂”匾额，悬于政事堂醒目处，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意，表示自己确实不是来做官的。

政事堂设在中南海遐瞩楼，在国务卿下设左、右两丞，分别由杨士琦、钱能训担任，内设法制、机要、铨叙、主计、印铸等五局和一个司务所，分别由施愚、张一麐、张元奇、吴廷一、袁思亮任局长，吴笈荪为司务所长。其中，机要局总揽政务，权力最大；主计局履行了财政部、审计局大部分职能，握有财权。原国务院各部的重要公文经国务卿核阅后，呈报大总统拍板定夺。

政事堂与各行政部门没有隶属关系，原国务院各部直接对总统负责，政事堂发布的政令上要有“政事堂奉大总统令”的字样。实际上，政事堂只是大总统的一个办事机构，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。

尽管如此，外间对徐世昌出任国务卿还是好评如潮，声称“如由他人当家，恐误国事于无形之中，而若由菊人当家，则后辈必然唯命是听”，希望众望所归的老徐用中庸之道，止杀息争，文治天下。

政事堂成立后，原总统府秘书厅裁撤，袁世凯权衡利弊，不失时机又进行了一番人事调整。

首先，将秘书长梁士诒调出总统府，改任全国税务督办、公债局总理。

作为老袁的贴身“大秘”，梁士诒知道的事情太多，又兼着交通银行总办，人送绰号“梁财神”、“二总统”，手眼通天，不可一世。

袁克定、杨士琦等人也总在袁总统那说梁的话坏，什么“心怀叵测、勾结军人、欲为总统”云云，多疑的老袁不能不防。

据说，在这次行政机构改革前，梁士诒曾向袁世凯建议说：“如欲扩张总统府，网罗人才，可将秘书厅扩大组织以容纳之，不必另设国务卿了。”老袁听后目瞪口呆，不置可否。

所以，梁士诒及其“交通系”树大招风，功高盖主，老袁这么调整也在情理之中。

拿下了“文臣”秘书长梁士诒，再拿下“武将”陆军总长段祺瑞。

袁段之间的亲密关系自不必说，可段总长久掌兵权，门生故吏遍布军中，性格又刚愎自用，盛气凌人，难免引起老袁的猜忌，渐生芥蒂。

为此，袁总统举重若轻地又露了一手，事先瞒着老段，在总统府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，亲自处理陆军部、海军部、参谋部的重要事务（其他人都是他的“办事员”）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

老段知道后，大发牢骚说：“当年朝廷不信任项城，今天倒好，总统也不相信我了。如此下去，他还能信谁呀？”

袁总统听说后可不在乎，给了老段一个统率办事处大办事员的虚衔（大办事员还有荫昌、王士珍、萨镇冰、刘冠雄、陈宦等，其中王士珍作用最大），让其靠边站了。

段总长一气之下也闹起了情绪，把陆军部的活儿一股脑儿都交给了次长徐树铮，自己在家当起了病号。

有一次，袁世凯问段祺瑞一件公事，段祺瑞回答说“要到部查明”。

老袁听一愣，一脸狐疑地说：“怎么还要查明，你不是已经上报呈文了吗？”原来，段祺瑞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事，都是由次长徐树铮代劳的。

袁总统本来就烦小徐，这下更不高兴了，事后大发牢骚：“咱们北洋团体还成什么样子，华甫要睡到12点以后才起床，芝泉老不到部办公！”

随即，袁总统一纸命令发给段祺瑞：“本人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，未便过听其劳，致增病势，特着给假两个月，并颁给人参4两，医药费5000元，以资摄卫。该总长务以时局多艰为念，善自珍重，并慎延名医详查病源，多方施治，切望早日就痊，立即销假。其在假期内如有军务重要事件，仍着随时入内会议，以抒嘉谟而裨国计。”

袁总统表明上挺客气，暗地里下了手。他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浮报军费，借此将徐免职。

另外，为了安抚进步党人情绪，袁世凯又拿出了“仵瓜俩枣”作为“安慰奖”。比如，任汤化龙为教育总长（后辞职）、张謇留任农工商总长、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，以示“皇恩浩荡”。

三、终身世袭总统

国会解体后，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咨询和立法机构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，可名不正言不顺的，难免引起非议，绝非长久之计。

因此，袁总统特意在新《约法》中规定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，名曰立法院。立法院未成立前，设立参政院为总统的咨询机关，并代行立法院的职权。

参政院都由哪些人组成呢？

袁总统给画出的道道是：有勋劳于国家者；有法律政治之专门学识者；有行政之经验者；硕学通儒有经世著述者；富于实业之学识经验者。

老袁这么安排，一来是做做样子，笼络人心；二来也是让立宪派们画饼充饥，聊以自慰罢了。

为了把这出戏唱好，袁总统在示好进步党人同时，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跑到青岛、大连等前清遗老们的住所，说什么“共和宣布，系政体之更易，并非清室之已亡，望勿以此芥蒂于怀，同出匡济，以救中国之危”，劝说老爷子们出来捧场。再加上“参政”这个头衔津贴不菲，待遇优厚，因此“首阳诸公均连翩而至”，济济一堂，皆大欢喜。

1914年5月26日，参议院正式成立了。

袁大总统任命汪大燮为参议院副院长，林长民为秘书长，前清遗老瞿鸿机、赵尔巽，进步党人熊希龄、梁启超以及袁系的梁士诒、杨度等70多人为参政院的参政。

让谁来当院长呢？

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分别让李经羲、孙毓筠牵头，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，效果不错。参议院这么重要的机构，更要找一个靠谱儿的人，才能和袁大总统唱好“双簧”。

老袁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人最合适，不过此人不在北京，在武汉呢。此人就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兼参谋部总长、湖北都督黎元洪同志。

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，黎元洪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日子过得那叫滋润。

起初，大总统对副总统也还不错。老袁挥毫泼墨，书写了四个大字：“民国柱石”，外加100万银元，一起送给老黎，以资鼓励。

随后，袁总统心细如发，又亲自题写了“中华民国副总统府”的匾额派专人送到武昌，替换下了“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府”的旧牌匾，以正名位。对此，黎元洪对袁世凯感激涕零。

不过，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，黎副总统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
勉强当选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，对副总统黎元洪仍心存猜忌。虽表面上看不出黎元洪有什么不臣之心，但难保在一定条件下没有立异之心，更难保有人以拥黎之名，行反袁之实。所以，把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放在外边，终非长久之计，必须调虎离山，控制起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